

曹聚仁 著

WEN TAN WU SHI NIAN

文坛 五十年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文坛五十年

曹聚仁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 335 号 邮编 200335)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80 千字 插页 3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7 年 6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 1—6,000

ISBN 7-80627-163-5/I · 62

定价: 19.00 元

出版说明

《文坛五十年》系我国现代已故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先生的一部回忆录性质的著述。此书最初于50年代中期由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的印数和发行范围有限,大陆广大读者很少有人读悉。此事距今已有40余年。今征得作者长女曹雷同意见,并授权首次在大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曹聚仁先生与20世纪中国文坛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过交往,本书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这些文坛轶事无疑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份珍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出版此书的一个缘由。

整理这部著述时,我们发现原书存在不少疏漏,这次出版,我们作了认真的校勘,但有些地方,为保持原书面貌,只加注以示正误。此外,原书分“正”、“续”两集,为方便读者阅读,此次出版,将两集合并为一。兹此说明。

编者

1996年8月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序

陈鸣树

曹聚仁先生是位著名的记者和编辑，曾首次报道过台儿庄大捷，主编过文学刊物《涛声》、《芒种》，并任《太白》编委；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对中国历史和哲学、文学都有深邃的研究，记录整理过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作为鲁迅的挚友，仅已收集到的重要通信就有 20 余封。他一生勤于著述，达 4 000 余万字，收入集子问世的有 70 余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又是社会活动家，1950 年移居香港后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因此，在探望大陆期间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非同寻常的接见。他生于 1900 年，逝世于 1972 年，活动于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空，关于他的生平，夏衍在《怀曹聚仁》一文中，说他“在香港那样复杂的环境中，他能三十多年不改其志地坚持爱国，是不容易的事，是当得上晚节可风的赞誉的。”（《随笔》1992 年 4 期）他的文化业绩，将与他的遗文同在。

《文坛五十年》一书，曾由香港新文化出版社于 1954 年问世。作者在《前词》中说：

《文坛五十年》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和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相仿佛，也可以说是由于他那部回忆录所触发的。所不同的是，梅氏之书，以他个人生活为叙述的中心，

我则以四围师友的生活为中心。我非文人，只是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的一角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已。（重点引者所加）

中国现代文学自从建立了这门学科以后，文学史的出版已不下数十种，但大都是学者所编撰，其中还不乏形式逻辑资料排比的高头讲章，因此，曹聚仁先生这部书，以其独特的构架，独特的审视眼光，更贴近当时文坛生活的感受，更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显示其独特的光彩。

例如，在本书上篇第一章：《年轻时代的上海》，作者便以切身的观感烘托了清末民初中国文学所由以产生的时代氛围。下篇的《前记》，作者开宗明义，遂以第一人称《我在上海的日子》作标题，展开了他带有个人色彩的叙述，变峨冠博带式的宏论为促膝谈心式的闲话，这是任何别的文学史所没有的。他说：“1927年以后，笔者和中国文坛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不仅是由于‘左联’和‘中华文艺界救亡协会’俨然成为中国文坛的核心，笔者也是当时一分子，而且笔者有机会和文坛的重要作家，虽不是全部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十分之八九以上，都有过往还；今日写入现代文学史中去的作者，很多是当时的年轻朋友。因此，笔者回忆这些师友的动态，那鲜活的印象，都在眼底，或许和那些道听途说的人的想法，大不相同。”

正由于作者是当事人，对现代文坛上的作家的评价不必仰视或俯瞰，即使对鲁迅这样的作家也是如此，他说：“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坛的彗星，他的眼光远大，头脑清晰，那是我们不可及的，但他决不是圣人。要把他想象为‘十全十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那是错误的。”这段话写于1954年，对嗣后中国大陆的造神运动，可说是一种先知式的针砭。任何历史人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应该给予理性的判断，即所谓“实事求是”。

是”，这才是唯物主义的要义所在。

曹聚仁先生说本书用的是史家的笔墨，因为作者以史人的地位。他说：“笔者个人的兴趣，一向在史学方面，对于文学，只能说是业余兼职；而由于国文教学上的利便，自然而然，成为课堂中的文艺批评者。”这就是说，本书的褒贬完全从历史的眼光出发；又由于作者所持的“课堂中的文艺批评者”的方法，从而使本书的陈述和描述获得了不拘一格取便发挥的特色。作者取得了摆脱学术论文般拘谨的思想自由度，使读者也获得了不必正襟危坐接受灌输的阅读心理，增加了心灵感印的阅读效果。当然，任何方式的学术著作都难以两全，可能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即懈怠了严格的逻辑程序、严密的思想构架，但作者意不在此，因此，本书之作，至少是诸子百家争鸣中之一家；满园群芳中之一花。

作者说：“我们治史的，并没有抹消个人主义在文艺上的成就。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鲁迅之下；而对文学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书中分析周作人的思想变迁，充分表现作者的史才、史德、史识，是最具代表性的章节：“他最初也是守着尊王攘夷的思想，后来一变而为排满与复古，持民族主义计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元以后，他又惶惑起来。五四时代他又趋向于世界主义，后来修改为亚洲主义。到了1925年，又觉得民国还未稳固，还得从民族主义做起（他曾介绍了一些弱小民族文学作品）。五四高潮过去了之后，宣布了他个人主义趣味主义，便从此贯串下去，成为他的思想的本质。”这一番话，曾获得周作人的认同，周说：“我的心态看来被你了解得透彻无遗。”像这样与作家对话式的描述，也是为别的文学史所不可能具有的。《知堂回想录》，正由于曹聚仁先生的鼎力，得以问世，成为周作人遗书中最具史料价值和民俗学价值的文献。

本书正因为是史家笔墨，作者论述每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要追溯它的根由和渊源，如由于现代化都市生活环境，促进了报章文学的兴起，“这种文体，从过去士大夫看来，未免粗糙刺眼，没有雍容尔雅的气度。但是面对着小市民阶级，恰正是粗糙的好，是一块砖头，不是一块玉石，砖头正好合上了用处。”又如解释梁启超新民体的报章文学，所形成的“笔锋常带感情”的风格，作者也是从社会环境、读者心理找到它的渊源，报章文学要有煽动力，要制造轰动效应，因此梁氏常常好“偏激”之论，以“天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相骇，因此，“笔锋常带感情”。对梁氏文风的体认，曹氏可谓得其神髓。

丹麦著名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说：任何文学现象，“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既然是其中的一小块，那就必然与周围的其他块相联系，与无边无际的网相联结。本书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描述，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写出了感性的唤之欲出的印象，如《年轻时代的上海》，作者以三个半大亨起家的畸形风习，烘托了海派诞生地的文化氛围。对文化氛围的烘托作者常常举重若轻，要言不烦，以感性的事象代之理性的剖析，例如书中对“洋务”的考察，又从中引出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介入。

作者不仅在书中引进了“关系”的范畴，从纵轴和横断面来论列文学现象，使之成为立体交错的感受。书中将时代、思潮对文学的关系，作为文学获得自身存在价值和品格的对应物，论之颇详，卓见层出。

作者又引进了“比较”的范畴。比较，从本质上说，是“关系”的衍生物，基于客体世界各别事物所呈现的有形无形的联系，存在于文化本源一体化的网状结构。书中标举了《章太炎与周作人》、《王国维与郭沫若》、《杜威与泰戈尔》、《胡适与鲁迅》等比较

课题。在《胡适与鲁迅》一章中说：

胡适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导师，对于这一运动是有利的，因为他一直诉之于理性，而不诉之于激越的情感的。……和胡适一样，诉之于冷静理性的，则有鲁迅。鲁迅在文艺上的造诣，比胡适高，对青年人的影响，也比胡适广，但鲁迅的文体，比胡适不容易学，周、胡两人，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水火不相容，他们都是《新青年》的前驱战士，而且在学问上是彼此相推重的。

后面这几句话更见出史家的卓识。

本书不仅因为作者曾是驰骋文坛的老战士，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又因为作者具备学者和教授的品格，因此，在浅表层次上虽然有着感性的具象性，使人读来通俗易懂，趣味盎然；但隐伏在其中的仍是通过知性分析所达到的理性思维高度。高屋建瓴而不失于空，谈言微中又不坠其实。加以娓娓道来如述掌故的那种绝无学究气的文风，保证了对读者的可接受性和亲和力。相信本书之重版，必将引起学界的注意和读者的欢迎，并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1996年10月24日

于上海复旦大学

目 录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序	陈鸣树
-------------------	-----

上 篇

引言	3
年轻时代的上海	6
一个刘姥姥的话	12
桐城派义法	18
启蒙	24
报章文学	30
江西诗派	36
新体诗	42
《人境庐诗草》	49
译诗与诗境	56
新小说	63
新戏曲	69
梁启超	75
晚清	81
民初	89
“五四”的前夜	99
《新青年》	106

五四运动·····	113
新文化运动·····	121
新文学运动·····	126
真假王敬轩·····	133
《尝试集》·····	140
新诗·····	147
小说的兴起·····	153
小品散文·····	159
《觉悟》与《学灯》·····	165
《北晨》与《京报》·····	168
《语丝》与《现代评论》·····	171
文学研究会·····	174
创造社·····	177
胡适与鲁迅·····	180
王国维与郭沫若·····	187
章太炎与周作人·····	190
杜威与泰戈尔·····	195

下 篇

前记：我在上海的日子·····	201
革命的浪花·····	207
《学衡》与后《甲寅》·····	214
鲁迅在上海·····	221
话剧之成长·····	228
新诗的进步·····	234
写实主义的小说(上)·····	241

写现实主义的小说(下)·····	251
言志派的兴起·····	259
《人间世》与《太白》·《芒种》·····	269
“大众语”运动·····	276
报告文学·····	283
戏剧的新阶段·····	290
战争来了·····	303
战场上的文学·····	312
抗战与诗歌·····	319
几个诗人与作品·····	326
离乱中的小说·····	334
抗战戏剧与新歌剧(上)·····	344
抗战戏剧与新歌剧(下)·····	352
小品散文的新气息·····	362
文艺批评之新光·····	368
史料述评·····	379

上 篇

引 言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

——王荆公《咏棋》

《文坛五十年》，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和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相仿佛，也可说是由于他那部回忆录所触发的。所不同的是，梅氏之书，以他个人生活为叙述的中心；我则以四围师友生活为中心。我非文人，只是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一角上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已。

我到上海之初（那是 1922 年），就在三益里陈望道先生的家中歇了脚。这位老师，后来成为修辞学的权威，上海文学界的宗匠；那时，他还只住在比亭子间稍大的后楼中编《妇女周刊》，他的修辞学还不曾动手。上海的文坛，还是周瘦鹃、陈栩园、包天笑、严独鹤的世界，徐枕亚的《玉梨魂》，那部哀艳的小说，也正在时行，连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都没上场呢！我还记得从上海《民国日报》社的破旧楼梯下来，走过《神州日报》社的黑墙头，总把那份张贴着的《晶报》细细看了一遍，那是张丹斧、马二先生（冯叔鸾）、袁寒云的天地。中国早期的小报，他们于才子佳人以外，夹点诙谐讽刺的情调，会心微笑，让我懂得一点理学气氛中所没有的风趣。和陈望道先生时常往来的，如沈定一（玄庐）、刘大白、夏丏尊诸先生，都是新文学的主将，大家都在邵力子先生的《觉

悟》副刊,以及《星期评论》、《文学周刊》,展开文艺的战斗阵容,这是代表五四运动以后南方新文学运动的主潮,和隔邻《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相呼应。那时,《时事新报》代表研究系,《民国日报》代表国民党,正是政治上的冤家,而《学灯》和《觉悟》两副刊,对于新文艺的推进,却是同路人;因此,后来代表新文学运动的文学研究会,一部分是《觉悟》的朋友,一部分是《学灯》的朋友,和政治上的歧见并不相关。

上海《民国日报》的另外一群人,如叶楚伦、柳亚子、胡朴庵、胡怀琛诸先生,他们都是清末民初“南社”诗文旧友。他们的诗文风格,属于清末的新诗派,而其气氛则属于民族革命的,因此,和《觉悟》这一群朋友,还是气味相投的。那一时期,《新闻报》的《新园林》和《申报》的《自由谈》,隐然成一壁垒,属于礼拜六派的作风,虽说不上和新文学相敌对,但敌对的意味,依然存在的。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周瘦鹃的《自由谈》,变成了黎烈文的《自由谈》,严独鹤的《新园林》以外,又添上了小记者(严谔声)的《茶话》,这就不是一场平常的变动了。新文学运动,毕竟奠定了基础,无论诗歌、小说、戏曲都转了方向,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我们即不说,看了民初的报纸,觉得幼稚可笑,连一份抗战前的上海报纸,看起来也不够分量呢!

有一天,郑洪年先生请客,席上主客是陈石遗(衍)先生,陪座的有叶公绰、张天放、龙榆生诸先生;在这位诗坛祭酒面前,我这个毛头小伙子真算不得什么了。席上,他们所谈的,都是陈古千年的故事,连榆生都插不得嘴,像是和羲黄上人相见,格格不相入的了。我是有机会见到沈寐叟、林琴南这几位宋诗派的诗人的,但我毕竟是刘大白、朱自清的学生,对于清末的宋诗派,起不了什么兴趣的。有一回,一位小姐念了许多《玉梨魂》中的诗篇给我听,这些诗也曾闯进我的心坎,反复环诵,不能自己的,但再

重听这位小姐的吟诵，却也索然无味了。

清末，有一位新派诗人蒋观云，他是我的乡先辈，曾有一首咏卢骚诗：“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争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从文坛这一角，正可以看到时代的趋向呢！

年轻时代的上海

1922年，我这个毛头小伙子，从武昌回到了上海，就那么定居下来了。那时候，我很年轻，上海也很年轻。年轻的人，不知道天之高，地之厚，不考虑上海居不易的问题；也想不到一脚踹进去便是一个文坛。茫茫人海中，我这样一个乡下人，当然渺不足道的了！

当时，上海有三个半大好佬（上海上语，便是滑头码子）。一个是中法药房大老板黄楚九。他那家药房，出了一种无铁质良药，“艾罗补脑汁”。因为用脑来“思维”是外来的新道理，上海人已经知道补脑的重要了。外来的自来血这一类补品，都是挂着铁质招牌，和东方文化是不十分合脾胃的；他特地标出了无铁的特征。这张药方是黄楚九的一位老朋友留德的医生开的，含有一般性安神健胃的作用，而且加点糖浆，颇为可口。“艾罗”便是“黄”字的英译，看起来像个洋人；瓶上印的是一位犹太人的照片。这样补脑汁就行销一时，黄老板的财就这么发起来的。他的最后杰作，便是有意想不到之妙的“百龄机”，他自己却等不及造百岁坊便死去了！

第二位大好佬便是洗冠生。他的母亲，当时只是替中法药房